

古人拜年常用“拜年帖”

如今，随着电话拜年、短信拜年的出现，贺年片、贺年卡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。可是在古代，人们似乎就没有这么轻松了。古时，有点身份的人在春节时都会用类似现在贺年片的“拜年帖”相互问候，而且，送“拜年帖”是个很郑重的事，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很慎重。“拜年帖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古人在春节时表示新春问候、吉祥祝福的专用帖子，类似于今天的“贺年片”“贺年卡”。古时，“拜年帖”主要在文人雅士、官府僚吏乃至朝廷君臣中使用，是社会上层、名流人士春节期间交往的专用品。

记载：“拜年帖”出现在唐代

“拜年帖”的出现，根据记载应该在唐代。当时春节已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，拜年活动不但普及到民间，也逐渐“程序化”“仪式化”。

随着纸张的普及，“文房四宝”成为上流人物，尤其是文人雅士广泛使用的日常用品，这些都为“拜年帖”的流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，人们再也不用拎着竹片、木片到处跑了。

唐代科举制度鼎盛，支撑其运作的关键环节就是“门生”制度。各地举子进京赶考，官方不设“资格审查”，但你得拜访名人，投身某个老师的门下做门生，从而获得推荐，才能打着老师的旗号去考试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用“门帖”了，谓之“门状”。

其间往来，尤其是录取放榜之后，必须上门拜谢，专用的“拜帖”随之产生。而春节表达心意的“门状”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“拜年帖”。

盛行：宋朝广泛使用“拜年帖”

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记载，“拜年帖”的盛行在大宋王朝，地点是当时的“国际性大都市”东京汴梁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。

催生“拜年帖”广泛使用的直接原因，除了显示身份、联络感情之外，还因为当时的人们越来越懒，疏于往来走动和面对面交流。当时的汴梁文人云集、官员众多，是上层人物聚集的地方。需要走动拜年的实在太多，带来几个问题：一是时间不够用，不该拜的拜了，那自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应该拜的没去拜，那问题就大了；二是见人磕头实在太累，就是作揖也会胳膊酸疼，不磕头不作揖又不够礼貌。怎么办呢？于是程序进一

步简化：用专用的帖子拜年。

宋代人周辉在《清波杂志》中说：“宋元祐年间，新年贺节，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。”对于那些平时往来较少的亲戚、关系一般的朋友、应酬不多的同僚或者生意伙伴，写张“拜年帖”派人送去，也就算是过节没有忘记你，如此而已。

北宋年间，开始出现名帖收藏家，并将所藏选刊刻石。如《游宦纪闻》记载的《元祐十六家墨迹》，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。其中著名词人秦观的《贺正旦帖》，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“贺年片”，也就是“拜年帖”。此外，“拜年帖”的用语也有严格的讲究，尤其表明身份的词语不能用错。

泛滥：“拜年帖”盛行过度包装

到了明代，投谒拜年成为普遍的交往形式，礼仪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内容。当时著名文人文征明，在他的一首题为《拜年》的诗中写道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纸朝来满蔽庐；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由此可见，“拜年帖”当时已经被大众广泛使用了。

与此相应的，就是“拜年帖”的高度形式化、华美化。宋明时期，“拜年帖”的制作越来越复杂，投谒的讲究也越来越多。有的在红绫制成的帖子上，撒上赤金为字，有的用整幅锦缎做帖子，上面的吉祥用语是预先织成的。

“拜年帖”泛滥的主要标志，是逐渐盛行“过度包装”：给帖子加上底壳，用不同颜色的包装区别不同的帖子。下级送给上级，用青色底壳，门生初见老师，用红绫制底壳等。

到了清代，“拜年帖”已经彻底变味儿。从文人雅士的酬酢、民间亲友的礼节，变成了官场应酬的工具，乃至皇家色彩的“规定礼数”。帖子上不但署名，还要用印，而且专门发明了一种拜匣，用来盛放“拜年帖”。拜

匣的出现，让“拜年帖”跟木头扯上了关系。

拜匣的出现除了礼仪的程式化之外，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使然。拜匣用料名贵，工艺精良，雕刻花纹、配饰

金银等，内中除了一张帖子，通常还有古玩玉器、珠宝金银，乃至直接放银票。从流传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，仅拜匣的红木材料就已经价值连城了。

小故事

三十张“拜年帖”让李鸿章惊出冷汗

李鸿章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，有一项职责就是代转海外使臣给皇上的奏折，其中当然包括每年的“拜年帖”。当时给皇上的节日奏折，也叫“请安折”，是最高等级的“拜年帖”。

那个年代没有快递，因此邮件传递得走海路，慢得很。因此，派驻各国的使臣要早早把“拜年帖”寄来，临到过节再由李鸿章转呈上去。

这时大清朝派驻美国的使臣是崔国因，此人不仅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，还是李鸿章一手提携上来的，甚至连崔国因出使美国，也是由李鸿章推荐的。

崔国因的外交业务水平没有问题，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太好，有时也不太注意细节。临到“封印”（春节放假）的前一天，李鸿章才发现，崔国因寄来的“拜年帖”出了大问题——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盖反了。再一检查，他寄来的三十个文件上的印花都是反的。按照大清公文管理规定，印花倒盖是“大不敬”，严重的话是要被杀头的，说不定还会牵连到李鸿章。

李鸿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：这种“拜年帖”递上去自然不行，不给皇上“拜年”更不行，更换又

来不及。幸好李鸿章不但会做官，尤其是“应急处理”水平一流。他马上找到奏事处打通关系，奏事处也很给李大人面子，总算把这事忽悠过去了。

但是奏事处最后“索京帑八千”，也就是说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后来向李大人索要了一些钱，代价可谓不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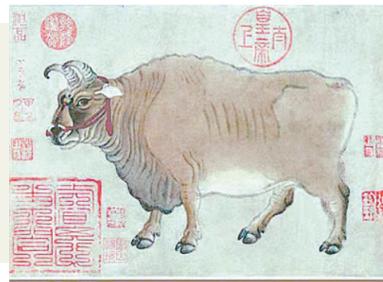
事后，李鸿章把倒盖的印章剪下查核，回寄给崔国因，责怪一通了事。



历史文化

古代社会中牛究竟有多“牛”

对于现代人来说，牛只是一种普通牲畜，但对于古人来讲，牛远比其他牲畜重要。在数千年农耕文化中，牛不仅为人们提供耕种劳力，还在占卜、祭祀、军事、治水、运输乃至民族精神的塑造上起过巨大的作用。



《五牛图》(局部)

韩洪作

牛能负重且柔顺“厚德”堪比大地

在古人心目中，牛不是普通牲畜，而是有着崇高象征意义和功能十分强大的“神牛”。

我国的群经之首《易经》，以乾、坤二卦象征天地，统领万物。《易经》说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又说：“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。乃顺承天，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”

牛能负重且柔顺，与坤卦相似，故《说卦传》称“坤为牛”，直言牛是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即坤卦的象征物，可见牛的“厚德”堪比大地。

而牛还与道家创始人老子有点关系。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时，关令尹喜命令门吏说：“若有一老翁乘青牛板车从东来，不要让他过去。”当天果然见一老翁乘青牛板车从东来，求度关，此老翁就是老子。正是在函谷关，老子把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传授给尹喜。于是，老子的座驾青牛自然变成了“神牛”。

中国文字的创立和发展与牛有关

商代先民很迷信，不仅作战、打猎、祭祀等大事要卜问，就连病痛、生子、嫁娶、天气等事也要卜问一下，而用于占卜的主要材料就是龟甲和牛肩胛骨。

我国最早的文字，也刻在这些龟甲和牛肩胛骨上，中国文字的创立和发展也与牛有关。

为何要用龟甲和牛肩胛骨占卜？可能古人认为龟和牛都是有灵性的动物吧。在古代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祭祀等级中，第一等级是“太牢”，第二等级是“少牢”。所谓“太牢”，就是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，牛、羊、豕(猪)全备。而“少牢”只用羊和豕，没有牛。

耕地镇水交通运输打仗都少不了牛

镇水要用牛。相传大禹治水时，每治好一处，就铸铜牛投入水中，以镇水患。后来历代治水者都效仿大禹，铸牛镇水。近年来，全国各地发现了不少铜牛、铁牛、石牛，这些“牛”有的在水底，有的在古河道两岸。

古人为何要用牛镇水？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牛不仅体型大，且与十二地支中的丑对应，而丑的五行为土，土能克水，故常用牛镇水。

《易经》说：“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……服牛乘马，引重致

文史趣谈

商家为促销支持分期付款

在古代，清空购物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毕竟想买东西无限，钱包有限，为了促进销售，古代商家也支持“信用卡”等付款方式，也就是赊账。

古代的赊账与我们一样，通过考核个人的资产收入等情况，决定赊账的额度与期限。很多古代富人出门就没有付钱的习惯，因为是大户人家，住哪儿，做什么的，整个城都知道，消费只挂账，到了月底，商家整理好账单，提供上门收款服务，所以于富人而言，赊账又叫月结。

而一般老百姓没有雄厚的财力，自然不能像富人那样直接月结，购物节里看上了大件，又没法付全款，于是就选择了账单分期。与商家商量分期的期数以及每期还款利息，再将自己暂时用不着的贵重物品作为抵押，以此实现“花明天的钱，圆今天的梦”。

若是在商品促销期，遇到商家不够给力，古代商家还有一个服务叫“撒野”，不管卖家需不需要，一律免费试吃试用，相当于我们如今的“七天无条件退换”。因为成本的原因，所以撒野这样的服务多用于食品类。假如一不小心买多了，古代的商家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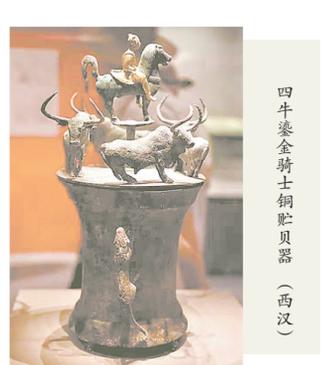
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随。”意思是，神农氏衰落，黄帝、尧、舜兴起，搞了很多创造发明，以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，包括驯服牛和马，发明牛车和马车，用于负重和运输。

而据近代学者研究，牛车是商人的祖先王亥发明的。此后，牛车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。

打仗也用牛。战国时期的齐将田单，发明火牛阵，用牛千余头，在牛角上缚上兵刃，在牛尾上缚苇灌油，以火点燃，冲向敌人，大败燕军，乘胜连克七十城。

此外，牛皮可制盔甲，牛筋可做弓弦，牛骨可熬制胶，也是制作弓箭的材料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军用物资。

耕种要用牛，占卜、祭祀、运输、打仗、镇水也必须要用牛。毋庸置疑，牛在古代确实是牛气冲天，“牛”得不



四牛姿金骑士铜贮贝器(西汉)

牛在古代受法律保护

正因如此，在古代“六畜”(牛、马、羊、猪、鸡、狗)的排名中，牛稳坐第一把交椅。在十二生肖排名中，牛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。

牛如此重要，就必须保护好它了，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律手段。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“诸侯无故不杀牛。”《汉律》载：“不得屠杀少畜，违者弃市。”《唐律疏议》载：“官私马牛，为用处重，牛为耕稼之本，马即致远供军，故杀者徒一年半。”在周代，诸侯不得无故杀牛，汉代不准杀少壮之牛，唐代杀牛要坐一年半的牢。此后，历代法律均严禁任意屠宰牛，除非牛年老体衰无法耕作，牛主人提出申请，经官府许可后，才能宰牛。就算是正常死亡的耕牛，牛主人想要出售牛肉，也要到衙门进行报备。

这种待遇，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，只有牛和马有资格享受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史海钩沉

古时的年终奖都有啥

古代有年终奖吗？有。

古代的年终奖最初和年底的腊祭有关。君王在敬天祭祖一番之后，会把一些牺牲之类的祭品送给重臣们享用，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终奖，年终奖制度到东汉才确定下来。

【东汉】“腊赐”在腊月腊日发放

东汉的年终奖有个听起来很霸气的名字——腊赐。所谓“腊赐”，自然是要在腊月发放的，具体哪一天呢？答曰：腊日。

在古代，腊日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且备受重视的节日，也被视作今日腊八节的渊源之一。但由于受历法变更和阴阳五行、五德始终学说的影响，具体日期并不固定，也就是古人说的“腊有常月而无常日”。到了汉代才明确称“腊，冬至后三戌，腊祭百神”；南北朝一度将腊日固定为十二月朔八；到了唐代，又出现“唐以大寒后辰日为腊”的说法。

《汉官仪》中有载：“腊赐大将军、三公钱各二十万、牛肉二百斤、粳米二百斛；特进、侯十五万，卿十万，校尉五万，尚书三万，侍中、将、大夫各二万，千石、六百石各六千，虎贲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；以为当衙门直，各随多少受也。”

据历史学家研究，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到五毛钱，二十万钱折算下来，

大概就等同于现在的8至10万元左右。而像大将军、三公之类的汉代高级官员，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钱，合人民币7000元，年薪则有8万多元。这样一算，仅实打实的奖金这一项，就超过了全年工资。

那么低级别的官吏呢？《后汉书·百官五》载：“千石奉，月八十斛。”荀绰《晋百官表注》曰：“《汉延平中》一千石月钱四千，米三十斛。”也就是说，像俸禄为千石这样的官职，腊赐为六千钱，大概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。俸禄为千石在汉代属于比较高的官职，至于那些百石以下的斗食吏，能领到的年终奖则少之又少。

【唐朝】年终奖标配发唇膏面霜

至德二年(757年)的七月和十月，唐肃宗命郭子仪与李光弼等率军讨伐叛军，并收复了长安、洛阳两京。乱世中登上皇位的唐肃宗准备在腊日这天好好地犒赏一下大臣们，这里面包括千里迢迢回到长安的杜甫。

腊日之夜，肃宗赐宴紫宸殿，君臣尽兴欢饮，肃宗一声令下：赏赐众臣！这从杜甫所作《腊日》诗中可见一二：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。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纵酒欲谋良夜醉，还家初散紫宸朝。口脂药随恩泽，翠管银钗下九霄。

第二天，杜甫拿着赏赐喜滋滋地回了家。家人们迎了出来，却见他手里只有两

个小盒子。如果你看到小盒子里放的东西，估计要大跌眼镜。皇上的赏赐就是这么朴素：口脂面药、翠管银钗。

所谓“口脂”，是用以防止寒冬口唇开裂的唇膏，《释名》说“唇脂以丹作之，象唇赤也”。面药则用以洁面护肤，均有滋润皮肤、预防皴裂的效果。至于“翠管”和“银钗”，则是拿来盛放口脂面药的器具。

辛辛苦苦一年，皇上的赏赐就是包装精美的护肤大礼包？其实，这在唐朝是一种习俗。据唐代小说家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忠志》记载，“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、腊脂，盛以碧绉牙笏”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：“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。”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，唇膏面霜几乎是唐代年终奖的标配。

现代人肯定不理解，年终奖不发钱，像汉代那样发点肉和米也成啊，发唇膏面霜是为啥？这是因为腊日一般在岁尾，加上长安靠近西北，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所以杜甫诗中上来就说“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”。以珍贵的御寒护肤品作为年终奖礼物，也算得上人性化的考虑。

【北宋】经常直接发五只羊

到了北宋的时候，年终奖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，也就是图个热闹。当时的社会流行戴花，皇帝在年底团拜会上，会先给官员们赏赐鲜花、绢罗花等。官品越高，花戴得越多。戴上花后，才能开始吃宴席。吃了饭后，才能领年终奖。不过，宋朝的年终奖主要是以食物为主。即便是宰相、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，每人也只有五只羊、五石面、两石米、两坛子黄酒而已。东西虽然不是很多，怎样运回家去，倒成了一个问题。你能想象一位位王公大臣牵着五只羊回家去的场景吗？当然了，宋朝的大官，明面上的工资还是挺高的。以著名清官包拯为例，他的收入包括工资(月料)、餐补(餐钱)、饮料补贴(茶汤钱)、取暖补贴(薪炭钱)、招待补

贴(公使钱)、岗位补贴(添支钱)，全部加起来，一年将近一万贯，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，超过600万元。

【清朝】“养廉费”是年终奖大头

在年终奖的发放方面，清朝的皇帝比较重视仪式感。虽然明面上的腊赐并不多，但是收礼的人也都很开心的，有些人还会写成文字专门记录下来。

按照《曾国藩日记》的记载，同治二年，正月初二出门拜年回来后，曾国藩接到军机处的咨文，同治皇帝发给他的年终奖赏包括福字、荷包、银钱、钱粮、食物，另外还赏了一个寿字。同治三年、四年，只写了获得年终奖赏，但没有写具体内容。同治五年，年终奖赏只有福字和寿字。同治七年，年终奖赏是荷包、福字和寿字。

由此可见，在年终奖的发放上，清朝的皇帝以祝福为主，福字和寿字是最常见的赏赐物。要是心情好一点的话，就会给发个荷包；心情更好一点的话，还会给一些银钱、钱粮。

不过，某种程度上，荷包只能算是新年开门红包，“养廉费”才是真正的年终奖大头。清朝的官员，除了平时的俸禄外，还有不少外快补贴。比如“柴薪银”，类似于现在有些单位的燃油补贴，一品文官的年薪虽然只有180两，但是，单此一项就可以拿到144两；年俸31两的九品文官，则可以拿到12两。“养廉费”制度始于雍正年间，按照曾国藩的说法，“文官增加养廉费，始于雍正三年的耗羡归公，武官增加养廉费，始于乾隆四十六年的补缺额名粮”。养廉费按照“地方远近、事务繁简、用度多寡”的原则实行差异化发放，是高级官员最大的一笔合法收入，甚至可以达到年俸的百倍。比如，年俸180两的曾国藩，养廉费每年有2万两；年俸80两的知府，每年也可以拿到2400两养廉费。乾隆五十三年的一份土地买卖文契显示，一块一百七十分地只卖了二两银子。也就是说，一位从四品知府的一年养廉费，可以买2000亩地。如此看来，清朝官员的年终奖是相当优渥的。

据《南国都市报》

